

# 日本政治家高碕达之助的对华交流之路

翟新

内容提要：高碕达之助是战后日本对华交流事业的开拓者之一。在两国关系极其困难的环境下，高碕坚持展开对华交流活动，尤其是为形成中日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经济交流通道做出了极大的贡献。高碕执着于发展对华关系的信念既源于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的国情及国民性的了解和理解，也得力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方面对于日本维护国家利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的信念，

关键词：高碕达之助 日本政治家 中日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日两国因冷战下的国际政治局势及日本政府坚持追随美国的远东战略的影响，故在很长时间内没有正式的邦交关系。但尽管如此，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日本的政界和民间一直有一批远见卓识之士，本着复交的目标和使命，在各领域积极推进对华交流事业。政治家高碕达之助虽然置身于保守阵营，却又是一位堪称日本方面开创对华交流事业的先驱者。他为中日关系正常化所做的大量奠基性工作，为两国最终恢复邦交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本人也由此在中日两国的政界及民间长期获有高度的评价。然而国内学术界对这样一位为中日关系建功甚伟的政治人物至今尚无专文论述，这不能不说是件遗憾的事。本文将结合国际政治过程，在主要考察高碕的对华交流活动的同时，也对其对华政策观进行分析，以期有助于我们对战后日本对华外交的特质及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前提有进一步的认识。

## 一、战前在华活动经历

高碕达之助生涯中和中国的交接点，实起因于其产业活动。高碕 1885 年生于日本大阪府高槻市，早在中学生时代就认定，将来能够解决日本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非水产业莫属，所以中学甫一毕业，这位民族主义意识十分强烈的少年便选择了当时

号称世界唯一的水产专门学校，即日本农商务省所辖的水产讲习所就读<sup>1</sup>。四年后，高碕从讲习所毕业，入东洋水产公司任工程师。1912年东洋水产公司因经营不善，高碕辞职出国，在墨西哥和美国各地修研制罐业技术。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高碕回日本创业，与友人创立东洋制罐公司，并自任支配人。1939年，高碕为了寻找马口铁的原材料，至中国东北考察，此后他和中国方面的联系也就越发增多。不久，高碕受时任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总裁鲇川义介的邀请，在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帮忙料理业务。随日本实行战时统制经济体制，钢铁等战略物质的调配越发困难，东洋制罐公司乘势兼并了北海制罐和日本制罐等公司，于是基本放弃原来的业务而变成军需工厂。1941年，高碕把日本国内的工作交由他人经管，专注于满洲重工业公司副总裁一职，也就是说，在中国东北的经济经营活动成了他的主要事业。满洲重工业开发公司当时的业务是经营钢铁、煤炭、化学、机械等重工产业，故也是十足的日本国策公司，为此一直受到日本关东军和军部的严密控制，公司内虽然也设有数名中国副总裁，但大小权力全掌控在日本人手中。次年高碕升任总裁，在这个重要位置上，为维持苟延残喘的日本战时经济而竭尽全力。1945年8月，高碕在中国东北迎来日本的无条件投降。由以上可知，战前的高碕，基本上是在经济领域内积极维护日本军国主义体制的一名重要骨干。

1946年5月，进入东北的中国共产党军队方面要求高碕协助当地复兴产业，高碕以专搞经济活动、不参与政治和军事活动为条件，同意担任东北地区的产业调查所副所长一职<sup>2</sup>。但不久，共产党军队撤退，国民党政府派军进驻当时高碕所在的长春一带，于是高碕又承诺帮助国民党政府方面复兴经济，并担任东北行营与中央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顾问。1946年，国民党政府开始遣返在东北的日本侨民，高碕任东北日侨善后联络机构的主任，成为统一处理东北地区日侨回国工作的日方负责人。

在这之后，美国方面决定从日本的机器设备中拆除其中的约三成作为“中间赔偿”，以满足各个盟国的对日赔偿要求。于是，国民政府方面打算将日本主要的钢铁厂和发电厂设备拆至中国作为赔偿物，遂委托高碕回国对日本的机器设备情况进行系统调查。这样，高碕奉命在1947年底回到日本。但稍后国共内战扩大，国民党政府的军队纷纷南逃。这时高碕根据美国占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关于中间赔偿已到此为止，所以没有必要再回中国的建议，便留在了日本<sup>3</sup>。1947

年，高碕因战争期间担任过国家经济领域的重要职位，受到美国占领当局的整肃处分。此后至 1951 年解除处分，高碕一直低调处事，有意疏远政治而只是关注实业的发展。

## 二、探索中日相互理解的途径

1952 年，日本政府出资的全国电力开发公司成立，深受吉田茂等当时的日本政府领导人信任的高碕被推荐为首任总裁。1954 年，高碕又以实业家的身份被邀出任鸠山一郎内阁的经济审议厅长官。经济审议厅即是后来的经济企划厅的前身。根据当时日本政治制度的规定，内阁成员必须是国会议员，于是高碕在 1955 年大选之际回故乡大阪参加竞选，并以选区内得票最多当选为众议员。以后，高碕在三次鸠山内阁中都出任阁僚，主持策划国家长期经济发展计划。1955 年万隆举办亚非会议，因美国不参加，日本执政党内也有人反对与会，但最终由鸠山首相决断，组成了由高碕任首席代表的日本政府代表团。这是战后高碕以政治家身分参与外交事务处理并和中国打交道的最初机会。亚非会议期间，日本外务省因顾虑国际政治的影响，反对高碕和中国代表尤其是周恩来总理接触，但高碕则认为中日政治家的晤面有不同寻常的意义，故而对此持向前看的态度。于是，在亚非会议期间，高碕如愿与周总理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周总理赞扬高碕为中国东北的产业复兴所做的贡献，并邀请其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中国大陆，这个外交姿态也为日后高碕等构建对华长期备忘录贸易体制铺垫了基础。会谈期间，高碕通过解释当时日本所处的特殊国际政治背景，要求中方理解日方在处理对华关系问题上受到美国和国际秩序高度制约的被动地位。高碕指出：日本虽然上上下下都希望和中国大陆实现邦交正常化，但“我国现在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上，都还没有得到完全的独立，还不能以自身的意志做想做的事情”；另外，以前和台湾之间所形成的、而现在又不能简单否定的政治关系，也对发展对华关系构成了很大的障碍<sup>4</sup>。也就是说，他在这里显示了当时日本保守政界普遍持有的看法：发展与大陆的关系，必须与日本已经承诺履行的旧金山条约等文件构成的国际法体制不相抵触。当然，这也是作为保守政治阵营一员的高碕当时的基本政治立场。

1957年石桥湛山任首相期间，高碕因支持该内阁大力发展对华贸易，为此得到了希望打开大陆市场的日本企业家的拥戴。石桥之后，高碕支持岸信介组阁。第二次岸信介内阁成立时，高碕任通产省大臣。1958年因发生长崎国旗事件，致中日经济及文化交流完全中断，次年高碕为解决日本的生漆原料问题，欲凭借自己和中共领导人之间的相互信任关系，直接给周总理去信求援，但岸信介首相和藤山爱一郎外相，则以现职阁僚给非邦交国领导人致函极易引发政治外交问题为由，出面加以阻拦，于是联系工作便改成托人转达口信的方式<sup>5</sup>。不久，高碕辞去通产相，担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东洋制罐公司顾问等职。1960年又作为政府代表和苏联进行日苏渔业交涉，就在这一年10月，高碕接受周总理的邀请，率领日本产业界人士，以私人身份访问中国<sup>6</sup>。

高碕欣然出访当时和日本尚无外交关系的中国大陆，当然主要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基于他一贯高度重视中国大陆之于日本社会发展的物理价值这一对华观。就是说，这个重视中国的基本观念辐射于这样的对华认识：日本和中国、苏联、美国等国国情不同，是一个无法靠自身的资源实现自给自足立国的国家，所以为了生存，只有依赖国际贸易；而日本虽然在政治上选择了欧美的西方阵营，但又和中国、苏联等东方阵营为邻，这就要求日本的政治家和实业家，必须学会和两个阵营的国家都友好相处的本事<sup>7</sup>。在这里，高碕明确把日本和所有国家和平友好相处视作他为政和从事实业的“根本信念”。可是，高碕的这个立场则被自民党内一些主张日本只需也只有和美国友好相处才是务实的政治选择的议员讥笑为：“宛如小孩一般幼稚的议论”和毫无现实性可言的对外理念<sup>8</sup>。

高碕通过这一次对中国的实地考察，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大陆的巨变，同时也留意到中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因此他也在各类会谈场合向中国领导人作了提醒和建议。对于当时中国方面批判日本政府敌视中国、要求结束两国不正常关系的呼吁，高碕则指出：两国关系的现状令人遗憾，自己作为曾签订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的一员也深感责任重大，但两国关系不正常的问题诚如周总理所言，责任不在中国方面，而我想说明的则是，那也不属日本国民的责任。“那么，这个责任到底在哪里，这正是我想通过和周总理进行充分的探讨去寻求的”<sup>9</sup>。高碕的这个姿态，不用说反映了刚成立不久的池田内阁在对华外交问题上的既想打开局面而又忧

虑节外生枝引发外交问题的微妙态度<sup>10</sup>；也折射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坚持的以产业为轴介入政治的社会哲学。

### 三、开辟中日长期备忘录贸易的通道

进入 20 世纪 60 年代，在中日之间建立长期稳定的综合贸易机制，显而易见是一个既符合两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有助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发展中日关系的重要事业。1962 年 9 月，时任大日本水产会会长的高碕，就扩大中日贸易的具体方案，与自民党国会议员中主张积极发展对华交流的领军人物松村谦三举行会谈，并确认了今后以新体制展开两国贸易的原则和具体做法：第一，下月由高碕率领日本钢铁、肥料、机械、海运、金融等业界的代表访华，展开贸易交涉；第二，高碕等访华期间，和中国方面缔结出口钢铁、肥料、机械、农药和进口煤、大豆、玉米、中药、铁矿石的长期易货贸易协定；第三，在做这些进出口贸易时，给予中方延期两年付款等贸易优惠条件<sup>11</sup>。

这时的日本政府也基本上以向前看的姿态，支持以备忘录贸易体制发展对华贸易，只是在给予中国方面延期付款和出口成套设备等方面附加了条件<sup>12</sup>。但与此相对，倒是日本经济界尤其是钢铁和肥料业界有不少人士，对建立中日备忘录贸易体制态度消极，有的甚至拒绝参加访华团<sup>13</sup>。这个动向的背后，实有美国和台湾方面施加压力的作用。该年 9 月 26 日，美国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哈里曼(William Averell Harriman)在日美协会讲演时指出：“日本如果坚持要和社会主义国家扩大贸易，结果也许会为其利用，最终将不利于日本。共产圈国家会要求日本做出政治让步。日本应该省悟这个危险”；另外，美国驻东京公使在会见日本外务省次官时也指出，日本如果一面拿着美国的资金援助，一面给予中共延期付款的贸易优惠，美国国民必然会对此感到不满<sup>14</sup>。而台湾当局则一面通过媒体展开对日批判<sup>15</sup>；一面频频对日本企业和有关机构施加压力，如台湾的粮食局局长李连春对日本三井物产、三菱商事等的驻台机构宣称，“如果日本的硫酸业界有代表参加高碕访华团，台方将撕毁从日本进口肥料的合同”<sup>16</sup>。

而日本政府则考虑到大陆肥料市场所具有的将来性，遂由农林大臣出面劝说硫

铵业界巨头，最终才得到业界承诺派出日本化肥出口振兴协会的一位中层干部参加高碓访华团<sup>17</sup>。当时，对美贸易约占了日本贸易总量的三分之一，而日本的钢铁则有四分之一是出口至美国，肥料约有八成出口至韩国和台湾，这个现状也是致使美台方面的外交压力一定程度上在日本经济界奏效的要因<sup>18</sup>。

高碓访华团一行 33 人于 1962 年 10 月 26 日出发，11 月 12 日回国。访华期间，高碓等和周恩来总理等中国政府领导人进行了三次会谈。11 月 9 日，廖承志和高碓达之助签署了《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并根据备忘录的两位签约人的姓氏分别为“廖 (Liao)”和“高碓 (Takasaki)”，将中日备忘录贸易命名为“廖高贸易”，或“LT 贸易”。中日备忘录贸易协定的内容实际上由两部分组成，一是备忘录，另是第一次协议事项。

备忘录的主要内容为：第一，两国民间贸易根据周恩来总理和松村谦三氏会谈的宗旨，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采取渐进及积累的方式加以发展；第二，双方同意发展长期综合的易货贸易，自 1963 年到 1967 年为第一个五年贸易期，在此期间平均每年进出口交易总额为 3600 万英镑；第三，中国主要对日出口煤、铁砂、大豆、玉米、盐、锡等商品，日本主要对中国出口钢材、化学肥料、农药、农机械和农具、成套设备等商品；第四，各项交易由日本当事者和中国对外贸易进出口公司签订个别合同；第五，各项交易以英镑及双方同意的其他货币结算；第六，日本向中国出口的部分商品的延期付款和成套设备的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则另行规定<sup>19</sup>。

在以上交涉过程中，高碓在两个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一是关于日本对华出口合成硫酸铵问题，在相关品目的贸易交涉中握有决定权的业界主要代表缺席的情况下，高碓代为做出了决定，同意自 1964 年开始向大陆出口与输往台湾同样质量的合成硫酸铵商品；二是在赞同向中国出口成套设备的问题上，根据达成的协议内容，显然已经突破了事前日本外务省拟定的不就成套设备出口问题进行协议的原则。即高碓等以回应中方需求的方式，不仅同意在备忘录中明确记述自日本出口的商品中包括成套设备，而且在协议事项中还具体规定从 1963 年至 1965 年出口的成套设备支付总额，每年为 100 万英镑。因这个交涉结果，以致有学者认为日方的姿态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碓个人颇具胆识的判断<sup>20</sup>。

当然，高碓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讲并没有超出自民党政权预定的基本方针范围，就

像他于此之前在向自民党要人表明的“为使自己的访华不致犯错误，希望政府和自民党能在出访之前就日中贸易的推进方式确定基本的方针”一语所示，高碕在对华接触中是一直自觉把将两国民间贸易活动纳入自民党政权对外方针的轨道，作为所有交涉的出发点和基本点的；而自民党政权关于这场所谓民间贸易交涉，其实也在贸易的条件、具体品目及推进机构等问题上基于对外政策的需要作过切实的研究<sup>21</sup>。就是说，高碕对华交涉中的让步毕竟是有限度的，当然在以一些非原则问题上的灵活处理最终促成谈判，尤其是使得备忘录贸易体制得以确立这一点上，它具有重大的意义。高碕和中方签订的两国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为期五年，自1963年至1967年为第一期，此期每年平均贸易额为三千六百万英镑。关于这个备忘录贸易体制的重要性，高碕这样为其定位：“不仅使日中两国经济贸易关系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而且是恢复日中邦交的巨大纽带”<sup>22</sup>。

高碕回国后，为了落实和实施贸易活动，经和松村等商量，作为日方的窗口，在设于东京的高碕达之助事务所的基础上，成立“日中综合贸易联络协议会”，并由高碕出任会长。自此以后，两国贸易除了以日中贸易促进会、日本国际贸易促进会等为窗口的友好贸易以外，又有了以备忘录贸易这条新的路道。而在松村谦三集团内部，也自然形成了在对华交涉方面松村执掌政治、高碕分管贸易的分工布局。就是说，在当时中日两国尚无正式邦交的状况之下，由松村、高碕等和中国方面设置的备忘录贸易体制除了在经贸领域发挥重要作用以外，还在两国高层间起着沟通政治意思的管道功能。

可是，就在中日备忘录贸易事业刚刚起步，尚需要高碕这样富于经验和有志于对华友好的人士继续为其掌舵之际，七十九岁高龄的高碕却于1964年2月24日离世而去。当天，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分别对高碕的家族发送了唁电。周恩来总理在电文中指出：“高碕先生在万隆会议上同亚非各国领导人共同创立了万隆会议十项原则，并在以后的几年为发展中日贸易和增进中日友好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对实现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必有深远的影响”；陈毅副总理的电文称：“高碕先生生前将他的晚年献给了中日友好事业，并作了重要的贡献。高碕先生的逝世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事业的重大损失”<sup>23</sup>。从中国领导人的这些电文中，我们除了可以感受到对高碕长期展开对华交流事业的高度评价以外，也可读出对逝者的钦佩和痛惜之情。

总之，高碕虽为日本保守阵营的政治家，但在两国关系极为困难的时期，不仅积极主张发展而且还努力实践对华交流事业，尤其是在为形成和维护两国备忘录贸易这一重要交流通道上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而成为高碕长期坚持对华交流的信念和思想动力的，并非完全是属于观念范畴的民族情感或伦理道义，而是既源于他本人非凡的战略视野及对中国社会有较深入的认识，更得力于其笃信中国在市场和安全上对于日本增进国家利益有着难以替代的价值这一对华观。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振声）

注释：

- <sup>1</sup> 日本经济新闻社编：《我的履历书 经济人1》，东京：日本经济新闻社，1980年，第429页。
- <sup>2</sup> （日）高碕达之助集刊委员会编纂：《高碕达之助集 上》，东京：东洋制罐株式会社（非卖品），1965年，第160页。
- <sup>3</sup> （日）高碕达之助集刊委员会编纂：《高碕达之助集 上》，第169页。
- <sup>4</sup> 《高碕·周会谈》（1955年4月22日），A' 1.2.1.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 <sup>5</sup> （日）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东京：原书房，1988年，第196-197页。
- <sup>6</sup> 《高碕氏出发访华》，（日）《朝日新闻（晚报）》1960年10月7日。
- <sup>7</sup> 《日本高碕达之助到达北京》，《人民日报》1960年10月11日。
- <sup>8</sup> （日）高碕达之助集刊委员会编纂：《高碕达之助集 下》，东京：东洋制罐株式会社（非卖品），1965年，第226-227页。
- <sup>9</sup> 《周总理在欢迎高碕氏的宴会上致词》，（日）《朝日新闻（晚报）》1960年10月12日。
- <sup>10</sup> 《首相答辩/日中邦交慎重而行》，（日）《朝日新闻》1960年12月15日。
- <sup>11</sup> 《扩大日中贸易的具体策/松村、高碕会谈意见一致》，（日）《朝日新闻》1962年9月27日。
- <sup>12</sup> 《通产相向高碕氏说明》，（日）《朝日新闻》1962年10月18日。
- <sup>13</sup> （日）添谷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1945-1972》，东京：庆应通信，1995年，第159页。
- <sup>14</sup> 日本外务省经济通商局：《关于美国政府方面对最近的日中贸易问题的见解》，《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年）》，E' 021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 <sup>15</sup> 《日本对匪贸易热的再发作》，（台湾）《中央日报》1962年10月22日。
- <sup>16</sup> 《国府警告废除进口肥料合同》，（日）《朝日新闻》1962年10月18日。
- <sup>17</sup> 日本外务省经济局：《关于肥料业界对中共、韩国、台湾出口肥料的动向》，《高碕·廖备忘录交换（1962年）》，E' 0212，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
- <sup>18</sup> 《钢铁业界等持慎重态度》，（日）《朝日新闻》1962年9月27日。
- <sup>19</sup> 《廖承志和高碕达之助关于发展中日两国民间贸易的备忘录及第一次协议事项》，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5-1970》，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646-648页。
- <sup>20</sup> （日）添谷芳秀：《日本外交和中国1945-1972》，第162-163页。
- <sup>21</sup> 《松村谦三氏向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作访华报告》，（日）《朝日新闻》1962年11月30日。
- <sup>22</sup> 《周恩来总理和高碕达之助先生在高碕达之助告别宴会上的讲话》，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9-1970》，第644-645页。
- <sup>23</sup> 《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吊唁高碕达之助逝世的电文》，田桓主编：《战后中日关系文献集1949-1970》，第711页。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 李振声）